从"文化保守主义"切入

——略论新《张之洞评传》的文化史透视方法

范 正 宇

提起保守主义，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文学著作中那类身着长袍马褂(或许还蓄一条老大长辫)在西装革履中昂然而行的"古董"形象，从而把它视为顽冥不化、抱残守缺、迂腐陈旧的象征。史学上，保守主义通常被用来指称一种落后、甚至反动的守旧势力；就是在一般的文化研究中，这一术语也大多出现于解释"文化滞后现象"的场合。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保守主义所下的定义是："指倾向于维护历史形成的、代表着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事物"；其特征在"不相信人的本性以及没有经过试验的革新，只相信不中断的历史连续性和传统"。

但事实并非人们想象和概括的那么简单。可以肯定地说，保守主义是产生于社会变革，尤其是历史转型之际，并相对于进步，尤其是激进势力而存在的文化倾向。如果脱离新旧交替的历史环境而又缺乏对应的文化比照，那就无所谓保守主义。由于特定的历史情状不同，对社会变革的反映不一，故实际的保守主义必然会呈现出复杂的形态与性格。例如，在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社会中，除了一成不变地恪守"皇清遗规"的顽固派之外，持"中体西用"观的洋务派显然属于保守主义的一种变通类型，它并非完全"不相信人的(创造)本性以及没有经过试验的革新"，而是兼具了某些革新与反传统的文化基因。西欧的情况也是如此。理论上，不仅有迈斯特坚决反对革命的激进式保守主义，还有E·伯克主张渐进的温和式保守主义。实践上，代表保守主义的政治团体至少有农民党、基督教民主党和保守党三大类型；并且，每一类保守主义政党内又有若干的支流与分歧的政见，从而纷呈不同的保守量度(如英国保守党便比其它国家的保守党具有更多的改良思想)。

可见，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远非一个简单定义就足以涵盖的，更不是顽固守旧的极端类型便能充分代表的。最起码地说，与极端保守型相对应的即有变通保守型。尽管后者并不一定体现保守主义的多数力量，但其时代反应却往往比前者具有更深刻的文化意义。尤其在社会交替的过渡时节，怀着开新意愿的保守主义，通常能以调节新旧势力的方式而发挥出新旧两方都难以替代的历史中介作用。

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冯天瑜、何晓明合著的《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便在分析和把握各类保守主义的前提下，针对中国近代化运动中的洋务派(特别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审慎地提出了"文化保守主义"概念。

既然"文化保守主义"产生于"古今中西大交汇"的"过渡时期"，它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新旧意识杂糅的矛盾个性。相对于极端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则富于开明性格，它并不一般地排拒进步和变革，而且还曾经有力地推动过某些社会进步和文化变革"；相对于"文化激进主义"，它又反对激变、全变观念，主张局部的渐变，坚持变易与不易的统一，即认定器用及制度文化的外沿部分可变，而伦常及制度文化的核心部分不变。其实质归结于在变革中坚持文

化的“民族性”(参见该书插页)。

值得一提的是，天瑜先生往年曾写过同名的《张之洞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 1985 年，下称《旧传》)，而“文化保守主义”概念甫见于新版《张之洞评传》(下称《新传》)，这就增添了一个新的文化视角。

凡三十万言的《新传 》分上下两篇。其上的《生平篇》大体是《旧传》的凝缩，但又显示了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因着力用张之洞传来呈现“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故传主虽在表面上不及曾国藩、李鸿章的当世显赫，亦不比康有为、梁启超的风云一时，却以其新旧特质复杂交织的鲜明矛盾性格，成为晚清社会最具典型意味的“过渡型”人物代表。传主的生平业绩，由此获得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第二，在《新传》由生平纵轴与思想横轴交错布署的坐标式结构中，《生平篇》还通过勾勒传主“从清流健将到洋务殿军”的人生主线，为下篇将其思想特质和文化人格还原到“过渡时代”的特定历史背景而作了一个先行的铺垫。《生平篇》这两个特点，正得力于“文化保守主义”概念所提供的崭新切入视角，才能抓住传主的人生走向，在准确的历史定位基础上作好历史还原的充分准备，从而为《新传》取得了“更上一层楼”的便宜方法。

作为大型《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新传》的重点显然放在《思想篇》。观点即方法。下篇根据文化保守主义内在的双重品性，对传主的心路历程展开了多层次的剖析和多方位的述评。由于传主是想通过“会通中西”的方式来扶助将倾之清代专制大厦，故无论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诸思想层面，还是其学术与文化观，都不能不体现出体用关系相悖而新旧意识相撞的矛盾纽结。集儒臣与能吏于一身的传主执着于人治主张，对新知隽秀既欣敬又恐惧、仇视的复杂心曲，导致他与一代英才俊杰们貌合神离，始合继分；身为洋务殿军，他那“以工为本”的卓识却植根于腐朽的生产关系，故其广兴实业、开辟利源的主观意愿与大投入、小产出、低效益的客观实效竟大相径庭；作为封疆大吏，他在学习西方军事上走得甚远，但其“攘外”与“安内”的目的仍系之于巩固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作为务实的外交家，他开始摆脱“天朝上国”那“以夷制夷”的虚骄心态，运用西方盛行的“均势”理论来处理外交关系，从而透露出其“总体文化观从传统型向传统——近代型过渡的征象之一”；作为教育家，他较早提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观念虽“具有近代教育思想的底蕴”，然而开新智、强体魄的新思想却统摄在占第一位的旧伦理道德之下；作为学问家，其“恶公羊，兼汉宋，通经致用”的学术宗旨，既流泻出接纳西洋技艺的实用心理，又蕴藏着抗阻西方新文化全面推进的底细。

显而易见，《思想篇》并没有采取普通传记著作那种平面的叙述方法，更没有简单地就思想来谈论思想，而是与上篇相互呼应，构造起一个文化背景——生平实践——时代思想的立体研究框架。作者毕竟是积十余年精力穷治文化史的专家，在《旧传》之后，《新传》之前又有《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作理论垫底，故以上分析所展示出的文化土壤分析、心理——行为分析、历史还原方法等多维视野，无一不体现出作者精湛的文化史研究方法与功力。尽管如此，文化保守主义概念所提供的透视角或切入点，无疑大大有助于作者从把握人格矛盾入手，通过传主的社会实践，将其错综驳杂的思想的方方面面，逐一还原到古今中西文化猛烈碰撞、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艰难蜕变的“过渡时代”之中。从而为该书增添了隽永的文化史研究趣味。

《新传》最精彩之处则是最后评述传主文化观的一章，这同时又是文化保守主义概念与方法展示得最透彻的地方。

政治家张之洞殚精于洋务事业，思想家张之洞则魂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唯有紧扣“中体西用”说的要害关节，才足以概括其复杂的文化观。“中体西用”说在冯桂芬、王韬等人那里已见端绪，其后康梁也时有所论。不过，前后改良派的“中学”均系先秦时代的“古学”，即他们用以认同和接纳西方民主主义的民本主义思想体系，故其“中体西用”体现了进步的开新意识。传主的“中学”则别具意蕴，实指秦汉以来的“近古之学”，即与西方民主思想根本对立的专制主义及其伦理学说。用它来生硬拼凑“西学”之用，便显露出逻辑错乱的破绽。但作者却敏锐指出，传主那割裂道器、体用关系的“中体西用”说，其实是借以挫败顽固阵营和抗拒进步势力的双刃剑。这种既要“务通以开风气”。又要“务本以正人心”的双重居心，以那带有过渡时代信息的典型文化保守主义性格，成为传主文化观的焦点。前述传主思想的种种矛盾纽结，正是汇聚在这一“务本”兼又“务通”的“中体西用”说(传统——近代型总体文化观)之下。

作者并没有浅尝辄止，而是循着洋务派的内部分歧来深究文化保守主义的层次差异。《新传》显然把“代表了晚清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不甘沉沦，力图振刷的意愿和势力”的洋务派，视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象征；“中体西用”说则是这一派别的文化纲领。既然传主并非“中体西用”说的倡导者和洋务运动的先驱者，而仅是其中的“最乐道者”和“最力行者”；那么，在洋务派内部，必然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量度差异。由于传主的“西学”范畴已从一般的器用层次拓展到“西艺”与“西政”两大领域，抵达洋务派所接纳的最大极限，其“中学”在挖掘“王制常宗”的内涵和总结“保国、保教、保种”及阻遏民权精神的功能意义上，又显示出洋务派中最为精致的理论构造；故仅仅是在传主身上，“中体西用”说才升华到了这一理论的最高水平。相应地，其“新政”实绩也远远超过曾、左、李诸洋务先进，从而使传主成为统治集团中对近代化贡献最大和对近代民主运动抵制最力的中坚分子。洋务派内部的这种高低水平，其实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的高低层次。作者便是在深入把握传主文化保守主义特质的基础上，才得以将其“开新与卫道二重变奏”的思想主旋律，清晰地凸现在“过渡时代”的历史屏幕上。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每一时代的文化精神都聚焦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身上。如果说，晚清是中国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之间一截忽明忽暗的走廊，洋务运动是通往近代化的一座不可或无的桥梁；那么，传主便是步履沉重地穿行在“走廊”和“桥梁”上最具代表性的“过渡型”人物。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逻辑与历史一致。既然文化史不仅要研究人类“开物成务”的“外化过程”，还要研究文化实践再塑造人自身的“内化过程”(参见《中华文化史》第10页)；那么，文化史研究基本区别于历史研究的，便是还原方法。《新传》最突出的方法论特征，恰在于此。文化保守主义概念所提供的切入视角，使作者灵巧自如地通过历史与思想的相互还原，生动地再现了传主在近代化初始之际进行艰苦“过渡”的人生轨迹，同时又恰如其分地概括出了传主被“过渡时代”规定和塑造的颇富“开新”意识与强悍“卫道”精神的矛盾人格。于是，作者对传主作出的种种文化评价，便尽有其本了。

虽然《新传》的“文化保守主义”是针对洋务派而提出的，但从作者的理论阐释来看，这一概念仍具有相当广泛的涵盖性。由于历史是呈“螺旋式”曲折发展的，“过去和将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相互交错”(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因此，不论是近代社会脱胎最早的西方，还是其后相继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浪潮的东方，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文化保守主义。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热月政变”，俄国的“民粹主义”运动，日本的“尊王攘夷”运动……，均有形形色色的文化保守主义在其中

扮演主角。倘若把文化保守主义排除在历史和文化史、思想史研究之外，那么不仅妨碍我们去求解特定环境下的时代课题，而且还将使我们难以准确地把握被各种表面现象所掩盖的历史发展走向。仅此而言，《新传》提出的文化保守主义概念，也不失为文化研究方法上一种有价值的突破。

最后，稍感遗憾的是，作者对传主文化观的民族性成分，似嫌肯定得不够充分。《新传》显然只是限于晚清"戊戌以前的特定历史阶段"来肯定"中体西用"说"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的，故进行全书最后总结时，便强调这一"不科学"的口号并不适用于今天来"讨论中外文化关系"。但笔者窃以为，"中体西用"说表面的浅薄逻辑和似是而非的机械理论，却是以背地浓厚的民族性为支撑的。尽管在阶级性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和包括传主在内的洋务派一样，都是在努力走一条中国式的近代化道路。如维新派倡"民权"而反"民主"，革命派过分看重"民生"问题而奇怪地恐惧于大资本发展和贫富不均，企图"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等等，都具有明显的逻辑矛盾，又都体现了深刻的民族性。由于民族资产阶级都不约而同地以民本主义传统来认同、汲纳和改造西方的Democracy，故他们仍在实质上继承了"中体西用"那会通中西的民族精神。无论近百年来泛起过多少"全盘西化"的"历史泡沫"，这一民族精神的潜流依然汹涌地奔腾而来。鉴于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迄今未竟的特定历史情态，我还想冒昧地替《新传》添补一句："中体西用"说及蕴藏其中的民族精神，仍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既然戊戌以来的近(现)代化主流都是要走出"中国特色"来的，那么，我们或许还将在某种程度上经历一段"中体(当然指中国社会主义)西用"的艰难道路，才能真正穿越"过渡时期"，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值《新传》首发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澎湃大潮来临之际，谨呈斯语，不知二位作者及海内外方正之家意下如何？